

往事

——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

第四十二期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

编者的话：文革后期，尼克松、基辛格的北京破冰之旅，像是一次化外蛮夷对中华帝国的朝拜。当这两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睹龙颜，便惊为天人。

何以至此？恐怕除了要搞关系、投其所好外，也有另一层的原因：盖因民主国家的领导人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诸多不便，动辄得咎，远不如做“人民领袖”来得潇洒。比如后来的水门事件，尼克松身败名裂，基辛格仅以身免，他们有理由羡慕毛泽东。水门事件之后，尼克松又跑来中国，周恩来摆酒压惊，席间细问经过，之后轻嗔：保密工作太差。

同尼克松们比起来，毛泽东这边却是另一番气象：翻云覆雨，所向披靡。

对毛泽东的任意挥洒，王年一先生颇费考证。考证出来的结果，与其说是什阳谋阴谋，倒不如说是一意孤行。“大人者言不必信”，可以不按理出牌。你给我出什么党纪国法、民主集中，我统统给你对“老和尚打伞”。境界至此，人莫予毒。如果说法治社会中的格言是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那么在集权社会中的格言却是“最高统治者面前人人平等”。

但是，究竟是谁造就了此等境界？这就是“中华帝国”的“道统”了。在这种“道统”下，谁是老大，谁就是天之骄子——“天人”也。在这种“道统”下，毛自身的修为就变得那么重要了。当然，重要者还有那个众星捧月的“中央集体”，其中包括曾手举宪法要求权利的“共和国主席”刘少奇。此外，我们这些“中国人民”是不是也有责任呢？黑格尔说，“有什么样的人民，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”。只有在阿Q的土地上，才盛产这样的“伟大领袖”。

“说真话”三个字看上去容易，但要做就像遇到了鬼打墙。王年一先生对此深有体会。但他仍旧坚持“说真话”——凭良知，也凭真本领。

“文革”漫谈 王年一

小序

萧乾老先生 1986 年 8 月在《北京晚报》上发表过几篇《“文革”杂忆》，我现在来写《“文革”漫谈》。萧老写的是亲身经历，我写的则海阔天空，举凡“文革”的人、言、行、事，无所不谈。大多不是亲身经历。

坦白地说，我没有写作计划。兴之所至，思之所至，随手写下。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故曰“漫谈”。

可敬的老人巴金在晚年写了一套《随想录》，以说真话而著称于世。“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”我如草芥，但敢自诩：拙谈中没有一句假话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我想一篇一篇写下去。

一篇文章的转载问题

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转载问题，曾引起轩然大波。

1967年2月3日，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、巴卢库时谈到这篇文章时说：“文章发表以后，各省都转载，北京不转载。我那个时候在上海，后头我说印小册子。各省都答应发行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。现在有些人靠不住嘛！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的市委。”

“各省都转载，北京不转载”，此说是“最高指示”，自然影响很大，成为定论。1991年8月出版的、供中共全党学习用的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》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，胡绳主编）也说：“文章发表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。”

且不说全国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转载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的文章，也不说从不转载、不发行得不出“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的结论，只说毛泽东说的“各省都转载”合不合乎事实？

这里提供一点资料：

（一）姚文1965年11月10日发表于上海《文汇报》。上海《解放日报》11月11日转载。华东各省报，分别于11月24日、25日、26日转载，这是各省市转载得最早的。11月24日转载的是《新华日报》（江苏）、《浙江日报》（浙江）、《福建日报》（福建）、《大众日报》（山东）。11月25日转载的是《安徽日报》（安徽）。11月26日转载的是《江西日报》（江西）。华东各省报显然得到了关于姚文发表的背景（即姚文是经毛泽东批准发表）的消息，所以在全国其他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之前转载了姚文。但也晚了十几天，不能算及时转载。

《五一六通知》附件二《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》记载：“11月12日至26日，上海《解放日报》、浙江《浙江日报》、山东《大众日报》、江苏《新华日报》、福建《福建日报》、安徽《安徽日报》、江西《江西日报》先后都转载了姚文。”这个记载本身就说明不是“文章发表以后，各省都转载”。这样写又是故意蒙骗人们，掩盖了除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外华东各省报到了11月下旬才转载的真相。

（二）11月下旬，上海市委向周恩来透露了姚文发表的背景，周向彭真打了招呼。罗瑞卿在上海也得到了信息，也向彭真通了风。彭真11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，布置北京报纸转载姚文。11月29日，《解放军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转载姚文。11月3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“学术研究”版转载姚文，加了根据周恩来、彭真的意见写成又经他们审改的编者按。12月2日，《光明日报》转载。

（三）从12月1日起，华东以外的省报才开始转载姚文。转载的日期是：《黑龙江日报》、《河北日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——12月1日；《山西日报》——12月4日；《陕西日报》、《湖北日报》——12月5日；《云南日报》——12月11日；《宁夏日报》——12月14日；《青海日报》——12月15日；《四川日报》——12月18日；《贵州日报》——12月19日；《西藏日报》——12月21日；《吉林日报》——12月24日；《新疆日报》、《甘肃日报》——12月27日；《辽宁日报》——12月29日；《内蒙古日报》——1966年3月4日。……请注意，这些报纸转载姚文时，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《人民日报》的编者按。新华社播发了姚文和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，它们刊登了。

（四）《南方日报》、《湖南日报》始终未转载姚文。

结论：毛泽东说“文章发表以后，各省都转载”是没有根据的。既然各省都未及时转载，为什么独独归咎于北京市委呢？

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项建议

看档案材料时，我看到一份没头没脑的材料：铅印，标题是“当前的几个问题（1966年8月12日）”，正文开列了10个问题，落款是“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印”，共两页。10个问题都写得很简略，如第一个问题全文是：“（一）强调学《十六条》，用《十六条》统一认识，统一行动。（写社论）”第10个问题全文是：“（十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《简报》，各省要求发一份。”

我很注意6、7两条：“（六）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。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。已经有外地来的七千人住在清华大学，吃饭、睡觉都成问题。”“（七）各校都以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革命为主要任务。一般不要到处乱跑，也不要抓别单位的人来斗争。支援别人最有效的办法，是以自己的先进经验帮助别人，也向别人学习。”

我推测这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供自己用的，10个问题系中央文革小组所议定。我之所以注意6、7两条，因为它与4天后陈伯达的公开讲话是迥然不同的。1966年8月16日，陈伯达公开讲话，鼓动外地学生来京。这篇题为《在大风大浪里成长——8月16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》，发表于《红旗》杂志1966年第11期。陈伯达说：“你们这次到北京来，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，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，经过很多辛苦，不怕大风大雨，你们的行动很对!!!”

为了弄清楚问题，我写信向当时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力先生请教。我附上复印件，问他两个问题：（1）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所议？（2）何以4日后陈伯达讲话的调子与此截然不同？

王力即复。承他于猴年大年初一（1992年2月4日）复我。复信不长，除称呼和署名并复信日期外，全文如下：“来信收到，简复如下：这一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。这时，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。会议期间，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仍继续进行。碰头会，周恩来和陶铸每次都参加的。这个文件，是最近几次碰头会上议的主要问题的概括，主要是向毛主席的汇报。当时大家都不赞成大批人员来京和串连，因为无法接待，而且会造成铁路和其他交通的压力。但是汇报后毛主席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条意见。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，中国的下一代，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，越多越好。所以才有8月16日陈伯达的讲话和以后的做法。原来，8月10日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见群众，看到了极其热烈的场面，他自己有深刻的感性认识，并动了感情。而这次接见，事先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不知道。祝新春安祺！”

王力在未曾发表、允我使用的《一年零两个月的回忆——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》中说：“大串连的根子在接见红卫兵。8.18大接见，主席提出，要几千万人直接同他见面，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。”

早在1966年6月1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（是在杭州召开的）就说过：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，应该赞成，应该免费，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！毛泽东要“天下大乱”，先“乱”而后“治”。

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大量坏事，名声很臭，其实它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过。这里提供了做好事的一个例子，不过好建议被否定掉了。

三个搞不通

关于“文革”，我有许多搞不通，本篇中且只说三个。

一是许多坏事为什么都归咎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？

林彪确实犯过错误，“四人帮”确实不是好东西，但是以明明不是他们干的坏事，加罪于他们，这是忠实于历史吗？例子举不胜举。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开过许多平反会、具有平反实质内容的追悼会，《人民日报》作过报道，十之五六说被平反者生前遭到林彪、“四

人帮”迫害。我所尊敬的金山也未能免俗，他在《莫将血恨付秋风》（载 1978 年 10 月 15 日《人民日报》）中说：“孙维世同志被‘四人帮’害死在冤狱。”孙维世明明被江青害死，为什么要说“四人帮”呢？孙维世 1968 年 10 月 14 日惨死狱中，那时“四人帮”还没有形成。文章又说：“杀害孙维世同志的元凶，是祸国殃民的林彪、‘四人帮’”，这更离奇了。林彪过去在苏联和东北恋过孙维世，在“文革”中与孙维世之死毫无干涉，怎么又扯上林彪呢？《人民日报》1978 年 7 月 6 日报道：“时传祥惨遭‘四人帮’迫害致死”，时传祥之死与江青公开点名批判直接有关，与他在 1966 年公开保护刘少奇有关，说“四人帮”是与事实不合的；国家出版局在《肃清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》（载 1978 年 7 月 7 日《人民日报》）中谴责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对出版工作的破坏，其实林彪从未问过出版工作；新华社 1979 年 8 月 2 日讯：“经中共中央批准，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林彪、‘四人帮’和那个顾问制造的所谓‘三家村反党集团’冤案彻底平反。”最初提出要批判“三家村”的是谁呢？最初说邓拓是“叛徒”的是谁呢？是毛泽东。时间：1966 年 3 月。

我无意为任何人鸣冤叫屈。我只是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忠实于事实。如果对事实都不尊重，还谈得到实事求是吗？

第二个搞不通是把提出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作为陈伯达的“罪行”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（特法字第一号）》说：“陈伯达……1966 年提出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’等口号，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。”这是作为“罪行”说的。

1966 年 7 月 8 日，毛泽东在致江青信中提出过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原话是：“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（不可能全部）打倒右派，而且在七、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”。毛泽东此信后来在全党公布。毛泽东可以说，为什么陈伯达说了就是“罪行”呢？

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是 1966 年 6 月 1 日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的标题。诚然，这篇社论是根据陈伯达的意图写成，又经陈伯达审定和签发的，标题也是陈伯达拟定的；但是它无非是“把《五一六通知》的内容捅向全国”（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1 年 8 月出版的《学习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〉》第 115 页），而且通篇只讲意识形态领域，说不上“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”。社论是公开发表的，彼时并无任何人反对，周恩来还在公众场合两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这篇社论。陈伯达在别处没有提出过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。

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是个极坏的口号，但是我们要划清“罪”和“非罪”的界限。

三是我搞不通对蒯大富判刑为什么要那么重（有期徒刑 17 年，剥夺政治权利 4 年）。

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过，她是“和尚打伞——无发（法）无天。”1970 年 12 月 18 日，毛泽东对斯诺说过，他自己“和尚打伞”——无发（法）无天。“文革”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。

陈云说过：“1966 年开始的‘文化大革命’是一场内乱。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。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。这场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有许多干部、党员、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。但‘文化大革命’从全局来说，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。因此，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，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，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。”（《陈云文选》1956-1985 第 274 页）中共中央同意这个意见，对于在“文革”中犯错误的老干部，一律从宽处理。从宽处理是正确的。

在那个“发疯”的年代（陈伯达在特别法庭上说的），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，一切怎么能够以常情而论呢？许许多多老干部在“文革”中都不辨是非，犯了错误，对他们从轻发落，为什么苛求于一个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大学生呢？

我搞不通不等于别人也搞不通，愿明达者有以教我。

毛泽东个人反对中央集体

从1965年11月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发表，到1966年4月，算作“文革”的准备阶段，或曰初步发动阶段。

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毛泽东个人反对中央集体。

不是耸人听闻，请看事实：

姚文是毛泽东批准发表。发表以前，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、巴卢库说，江青说：“这篇文章只给你（指毛泽东）一个人看，周恩来、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，因为要给他们看，就得给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彭真、陆定一这些人看，而刘、邓这些人是反对这篇文章的。”毛同意。这说明，毛是背着中央集体批准姚文的发表，而且是明知中央集体不会同意姚文的观点而批准发表的。发表以后，又隐瞒是毛批准的这一事实。全国各地都未转载姚文，却归咎于彭真和北京市委。更重要的是姚文本身是借题发挥。它固然是打击、诬陷吴晗的，更是在所谓“单干风”、“翻案风”问题上算中央集体的老账。“单干风”和“翻案风”，本是毛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集体的无理谴责，中央集体默默忍受了。事情已成过去。此时重算旧账，对中央集体加以鞭挞。姚文的要害，正是无理指责中央集体。

批判《海瑞罢官》这一炮没有打响。和者甚寡，反对姚文的很多。毛泽东、江青又开辟一个战场——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。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，请解放军“尊神”以“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。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的真正作者是江青、陈伯达、张春桥、毛泽东。陈、张始终参加修改，毛修改三次并定稿，“林彪同志委托”六个字是毛亲笔添加，以增加文章的份量并拖林彪“下水”。这个文件，提出了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。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，更是对中央集体的非难。

准备阶段里最大的事件是批判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。彭真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。批彭，说到底，就因为他有限度地保护过吴晗。罗瑞卿据称有两大问题：一是反对林彪提出的“突出政治”，这是真的，正确的是罗瑞卿；二是“篡军”，要夺林彪的权，这是假的，军队大权任何人绝不可能篡夺。陆定一只有一件事：他的夫人严慰冰写过匿名信。写匿名信不足为训，但是反对的是叶群。所写都是生活问题，不是“反革命匿名信”。严慰冰写信，陆定一并不知道——从信的内容来看，是特别不宜让丈夫知道的。杨尚昆据称私放过窃听器。所谓“窃听器”，原来是录音机。录音机又不是杨尚昆而是汪东兴要人放的。（撤了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，接替杨的正是汪东兴。）批判这四人，可以给以八字评语：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错误批判，既是对着四位老革命家的，又不止是对着四个人的，而是带有“扫清外围”的性质。后来发生的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毛泽东1966年3月底与康生等人谈话时，明确号召“向中央进攻”。“向中央进攻”这五个字，赫然印在《五一六通知》的附件上，发至全党。

准备阶段还有其他一些特点，如：反常；扑朔迷离；迂回曲折；借用军队力量；武断和专横。这些特点，都是由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个总特点派生出来的。

中共中央的一次全会

这次全会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。会议虽然只开了12天，但是发展变化很大。

会议开得十分仓促。1966年7月24日才发出开会通知，8月1日就开会了。刘少奇在开幕会上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，十分简略，而且没有印发文字稿。会前，毛泽东与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之间对工作组的评价实际上存在意见分歧。

会议本来打算开5天。邓小平8月1日在会上说：“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：一、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。二、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国内、国际问题上的重

大措施。三、全会要搞公报，最后要通过公报。……”虽然毛泽东在会前多次谴责工作组和派工作组，虽然毛泽东在刘少奇 8 月 1 日讲话时又一次插话抨击工作组和派工作组，但是附和者寥寥。8 月 4 日，全会发生异常情况。原定下午召开大会，与会者到会场后才得到改开小组会的通知。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

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份量很重的话，主要内容是：在前清时代，以后是北洋军阀，后来是国民党，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。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。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。中央下令停课半年，专门搞文化大革命，等到学生起来了，又镇压他们。说得轻一点，是方向性的问题，实际上是方向问题，是路线问题，是路线错误，违反马克思主义的。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，否则很危险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。规定班与班、系与系、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，这是镇压，是恐怖，这个恐怖来自中央。毛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，点名批判了李雪峰。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，要负主要责任时，毛说：你在北京专政嘛，专得好！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，不怕牛鬼蛇神时，毛说：牛鬼蛇神，在座的就有。毛泽东提出，各组传达、讨论他的讲话。全会议程为之改变。

各组讨论时，没有随声附和者，没有对毛 4 日讲话的热烈拥护者。这是个重要情况。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党内核心领导发生矛盾，大家不好随便插嘴。“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”等语，大家也不能接受。绝大多数省、市、自治区都是派了工作组的。

既然如此，毛于 8 月 7 日在全会上发表了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。指责更严厉了，上纲更高了。印发这张大字报的前夕，毛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。林乘专机返京。为什么要林与会，这是不难明白的，借重军队了。大字报发表及林彪与会以后，会上空气更加紧张。

紧张归紧张，因为大字报点到“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”（打击面更大了），大字报上纲又很高（“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”），所以除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等人外，依然没有附和者。除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等极少数人外，无人表示拥护这张大字报。

往日，毛泽东一呼，下面百诺。这一次，情形迥异。

于是毛泽东决心改组中央领导机构。他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 11 人名单。

8 月 12 日下午，林彪主持大会。大会内容之一是选举。尽管人们思想不通，对上述 11 人大多还是投了赞成票。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陶铸、陈伯达、邓小平、康生、刘少奇、朱德、李富春、陈云 11 人全部当选。其中得全票的有 4 人：毛泽东、林彪、邓小平、康生。只少一票的有周恩来、陶铸、陈伯达 3 人（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投自己的票）。其他 3 人得票超过半数。

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，是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。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，中共中央在八大后分为第一线、第二线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邓小平在第一线，主持中央工作，毛泽东退居第二线。事实上毛始终未完全退居第二线。）毛泽东重返第一线，把大权集中在个人手中，这是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。

把个人置于中央集体之上

本篇接着上一篇来说。

上一篇说到，毛泽东取消了中央第一线。那么，在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以后，毛泽东是否尊重、依靠、服从中央集体呢？这让事实来回答。

毛泽东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发起了红卫兵运动，这是没有取得中央集体的同意的。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 日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，但是全会并无任何肯定“红卫兵”的表示。《十六条》没有提到“红卫兵”，而只提到“革命青少年”。在毛泽

东提出召开的号召造反的“8·18”大会上，毛泽东让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，让红卫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“红卫兵”的袖章，又检阅了红卫兵。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。果然，在这次大会以后，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，遍及全国城镇。没有红卫兵运动，就没有后来那样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毛泽东亲自倡导了大串连，这也是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。毛泽东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师生，被接见者达1100万之多，这本身就是对大串连的提倡、支持和鼓励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是在1966年9月5日发出过一个组织外地师生来京的通知，那也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。这种数以千万计的全国大串连，这种乘车、坐船、吃饭、住宿都不要钱的全国大串连，为古今中外奇观。不仅数以亿计的金钱花掉了，更造成全国性的动乱。

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是毛泽东专断提出的。高文谦在《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》（载《文献和研究》1986年第1期，《人民日报》1986年1月5日转载）中说：“1966年10月，毛泽东提出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。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。为此，他专门找了毛泽东，……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”。《红旗》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首次公开提出“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必须彻底批判”。社论发表前，陶铸、王任重提出异议，均遭拒绝。批判所谓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实际上就是批判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。且不说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并不存在，这与组织手续也不合。在全国批判的结果，是天下大乱。

毛泽东个人决定在工厂、农村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形式上是中央集体决定的，实际上个人决定的。（名曰集体决定实为个人决定的情形过去屡见不鲜。）毛泽东否定了陶铸、余秋里、谷牧为阻止在工交企业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而主持制定的《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》（其中规定进行正面教育，不搞“四大”）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不得不通过要求在全国工交企业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的《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、促生产的十条规定（草案）》（1966年12月6日下午通过的）。过去一系列经毛泽东批准的不在工交企业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中共中央文件（包括《十六条》），被推翻了。至于要求在农村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（草案）》，是林彪主持的，1966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。林彪在会上念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批示：请林彪主持会议，开会通过，现即发出。这样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动乱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工矿和农村。

毛泽东批准了打倒陶铸。陶铸身任六要职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。他在一系列问题上，坚持原则，反对“左”倾错误。水火不容。1967年1月4日，陈伯达、江青在公众场合污蔑、攻击他。奇怪的是，顷刻之间，他就被打倒了，再也不露面了。1月8日，毛泽东在内部讲了一番话，实际上批准了打倒陶铸。这都是无法无天，因为只有中央全会才能够撤陶铸的职。而毛泽东于2月6日在内部严厉地批评陈伯达和江青，对陈伯达说：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。这种批评，令人啼笑皆非。（毛泽东不也是“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”么？既然打倒错了，为什么不推翻这个“打倒”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？）

毛泽东号召全国夺权。1967年1月8日，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，高度评价《文汇报》社的夺权，说：“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，这是一场大革命。”“上海革命力量起来，全国就有希望。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，影响全国各省市。”（这些话，当场写进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，毛当场审定，次日发表。）1月15日，陈伯达、周恩来在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先后讲话，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“接管风”。当日毛泽东闻讯，召开会议，讲话批评周、陈。王力等据以写成《红旗》杂志评论员文章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》，经毛泽东审定。1月16日，《红旗》杂志和《人民日报》同时发表。此文在“文革”中第一

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。